

張東蓀生卒年記載誤差之省思：歷史事實的時間與歷史解釋關係間的一個小個案

葉其忠

摘要

二十多年來，許多有關張東蓀的生卒年的記載常有出入。本文根據最近幾年最新的研究成果，把這些記載加以整理，切確指出張東蓀出生於 1886 年，死於 1973 年。這個結論得來不容易，因為張東蓀的生年雖純是史學資料和考據的問題，只要相關條件足夠，就可以解決，但張東蓀的卒年，則因政治整肅、政治壓迫、政治避諱、政治禁忌和政治疑案等等因素而無法確定。但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說張東蓀的正確生卒年可以有一組以上的問題。這就是歷史事實的實在性，以及其發生的客觀時間和歷史解釋關係間的史學問題。即使在釐清上會碰到種種方法與技術問題，但歷史事實和歷史解釋間的界線是不容混淆的。本文用該是最不可懷疑，在理論和實際上只能有一組的張東蓀的生卒年做個案，來強調即使在記載上張東蓀的生卒年有幾組，正確答案只有一組。爲了提高說理的有趣性，本文也引用了二、三個隨手得來的例子，如用耶穌誕辰來標示目前全世界廣泛使用的公元紀年的錯誤，和中國的年號之複雜性問題，來加強日期的確定，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簡單。最後，本文的根本涵義在於重申本不必重申的歷史的對象的真實性。

關鍵詞：張東蓀的生卒年記載的誤差；歷史事件的時間和歷史解釋的關係；以耶穌出生年為公元紀年的誤差

A Reflection on Mistakes about Chang Tung-sun's Dates: A Minor Case Illu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ting of an Historical Fact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Yap Key-chong

Abstract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in the past, there have been divergent reports on the dates of Chang Tung-su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most recent research of the past few years, through gathering and collating the results into a coherent way so as to point out precisely and accurately that Chang was born in 1886 and met his death in 1973 under most heart-rending circumstances. This conclusion on Chang's dates has not been easy to come by, because though his date of birth has been purely a question of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investigation—as long as there are enough relevant conditions, it can be solved relatively easily—, this has not been so with respect to the date of his death, for this had involved, and in fact still involves, various elements of political purges, political oppression, political scares, political taboos, as well as politically unsolved cases of persecution, etc. However, all this can not mean that more than one set of dates for Chang's life exist, which is of course out of the question. This is an historical question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eality of an historical fact, its occurrence within the flow of tim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ch a fact on the other. Even if any attempts at clarifying this relationship will encounter many methodological an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the line between an historical fact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is not to be confused and compromised. This article makes use of what should be the most indubitable, both in theory and fact, dates of Chang as a case in point, to emphasize that even if there have been many divergent reports on his dates, there can only be one correct set. In order to drive home this argument, a couple of readily available instances are employed. These include the use of the (mistaken) year of the birth of Jesus as the mark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AD) which is now known as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nd some extremely confusing reigning dates found in China. The simple purpose here is to stress that an apparently simple task of the dating of a lifetime as I have found in the case of Chang is not as straightforward as one would generally imagin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meaning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iterate what ought to be a truism for an historian, namely, that there is reality in historical fact.

Key phrases: Mistakes about Chang Tung-sun's d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ting of an Historical Fact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Mistakes in the Dat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AD).

張東蓀生卒年記載誤差之省思：歷史事實的時間與歷史解釋關係間的一個小個案

葉其忠*

- 一、前言
- 二、我的張東蓀生卒年說法
- 三、1995 年前我所見過有關張東蓀生卒年的歧異說法舉例
- 四、張耀南與左玉河對解決張東蓀生卒年之貢獻
- 五、歷史事實的時間與歷史解釋關係間的二、三個相關且有趣例子
- 六、結論

一、前言

「各式各樣的東西，從古代至今日世界，都銘刻著日期 (date)」¹

在這個資訊發達的二十世紀，我們仍然可以發現看來是簡單不過的生卒年問題也有時會因種種原因而無法確定。不但無法確定，甚至有時會以訛傳訛，造成認知和理解上的錯誤，以及判斷和行動上的困難、麻煩和代價。沒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¹ E. G. Richards, *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

有正確的認知和知識，就會比較難，甚至無法得出正確的判斷和答案，進而錯誤的決定和錯誤的行動之可能性也就大大地提高了，就好像盲人摸象，很難知道象的真面貌一樣，而不知象的真面貌又如何對待它呢？要說明這點，即真實的把握之必要性和優先性，張東蓀的生卒年疑問可以做為一個例子。

現在我們知道張東蓀出生於 1886 年，死於 1973 年。這個結論得來不容易，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我曾在三個地方提到張東蓀生卒年，雖三次皆無誤地提到他的生年，但只有最後一次才得出他的正確的卒年。這說來有點不可思議，但一經說明，則是相當容易理解的，本文的目的即在解釋個中的因由和涵義。

二、我的張東蓀生卒年說法

過去有關張東蓀的生卒年的記載幾乎沒有一致性的說法，且常常二者俱誤或其中之一有誤或不確定。我在第一次提到張東蓀的生卒年是在 1991 年春天通過的相關博士論文，題為“Western Wisdom in the Mind's Eye of a Westernized Chinese Lay Buddhist: The Thought of Chang Tung-sun (1886-1962)”（『一個西化中國居士眼中的西方智慧：張東蓀的思想（1886-1962）』）²。

在論文的第一章（見論文頁 1）我寫道張東蓀生於 1886 年，死於 1962 年，並在 1886 年這個生年的說法裡加了個註（見論文頁 131）曰：

現有關於張氏生日的記錄有如下歧異說法：

a. 1883: 謝扶雅，〈懷念張東蓀先生〉，《傳記文學》，卷 29 期 6【（1976·12）】，頁 91。在此短文裡，謝氏提到【幾乎】所有可能的出生日期，即 1883、1884、1886 和 1889。

b. 1884: 楊家駱，《民國名人圖鑑》，【（上海：1937）】，

² 葉其忠(Yap Key-chong), "Western Wisdom in the Mind's Eye of a Westernized Chinese Lay Buddhist: The Thought of Chang Tung-sun (1886-1962)", Oxford D.Phil. Thesis (Hilary Term, 1991), 662pp.

卷 5，頁 136。

c.1886 : Chan Wing-tsit(陳榮捷) trans. and comp.,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th Printing, 1973)】, p.xvii. 本文採用此說法。

關於張東蓀的卒年，我此時以為是 1962 年，且是在憂鬱中死去（見論文頁 129）。下面我們會提到二個看來言之鑿鑿的張東蓀死於 1962 年這個在海外相當流行的看法。那時我提出此說法時，也加了個註（見頁 129 註 bd）如下：

沒有證實的報導（見【Wen-shun Chi（紀文勛），】*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Modern China*, 【: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New Brunswick and Oxford: Transaction Books, 1986), 】, p.160 上）說張死於 1976 年，享年九十歲。他的一個兒子，物理學家張宗燧，據官方報告已被「四人幫」整死；同一報導也說是毛澤東自危厄中解救張東蓀，並親自建議他辭職，同時保證他的生活及安全，只要他答應「關起門來讀書」。這看來好像是毛所喜愛，但具譏諷性處置他曾尊重且領教過的知識分子的方式。例如艾愷在《最後的儒者》所生動描述的梁漱溟就是個例子。³

我們現在知道張東蓀不是死於 1962 年，也不是 1976 年，而是 1973 年；因文革，他的三個兒子，不只如上引文所說的，只死了一個，而是二個（即長子與三子，皆自殺，而不是此處所說的是被整死，參見下文），另外一個則（次子）因長期受監而精神失常；此外他的二個媳婦也因文革而與他

³ 原文如下：“An unconfirmed report (in *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Modern China*, p.160) says that Chang died in 1976 at the age of ninety. One of his sons, Chang Tsun-sui, a physicist, was officially reported to have been persecuted to death by the Gang of Four. The same report also states that it was Mao, saving Chang from serious trouble, who personally suggested that Chang resign and who guaranteed Chang’s livelihood and safety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would “read books behind closed doors.” This seems to be Mao’s favourite, but sardonic, treatment of intellectuals he once respected and learned from. See, for example, Liang Shu-ming’s case as vividly described by Guy S. Alitto in his *The Last Confucian*.”

們的先生一起自殺。

本文作者第二次提到張東蓀的生卒年是在“Culture-Bound Reality: The Interactionistic Epistemology of Chang Tung-sun”, *East Asian History*, No.3(June 1992)。在該文頁 77 裡我提到張東蓀生於 1886 年，死於 1972 年。可見，我此時對張東蓀的生年說法雖無改變，但他的卒年已從 1962 年改爲 1972 年。我現在發現這個卒年是錯誤的。我那時在提出這個錯誤的卒年時，也加了個註。這個註寫道：『關於張東蓀生卒年的報導有歧異，有的說他生於 1883，1884，1886，1887，或 1889 年，而死於 1962，1972，1973，或 1976 年。』⁴可見雖我取張東蓀生於 1886 年，死於 1972 年，但我仍無法斷定張東蓀的真正生卒年，原因當然是因所參考的資料或記錄無法提供確切的證明。雖然如此，我還是取 1972 年爲他的卒年，其根據是在比較各種可能的說法後，覺得凡是有提出理由的說法，在沒有反駁前則先加以暫時接受。現在我發現當時這個慎重的方法和態度還無法解決事實的問題。

說到我第三個張東蓀生卒年的說法，那是 1996 年的事了。那時我又更進一步總結各方的證據和說法，並在給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⁵ 簡介張東蓀的二千多字的小文章中分別取 1886 年和 1973 年爲張東蓀的生卒年，而沒有提及比較詳細的月和日。⁶這個生卒年說法現在已確定是正確無疑的。這得感謝張耀南和左玉河這兩位專門研究張東蓀的博士的研究。以下我們會詳述他們之間對相關卒月和日的差異。

三、1995 年前我所見過有關張東蓀生卒年的歧異說法舉例

現在先回頭就我多年來所見對張東蓀生卒年有歧異說法的資料或記錄，

⁴ 原文如下：“Reports differ on Chang's dates. It has variously claimed that he was born in 1883, 1884, 1886, 1887, or 1889, and died in 1962, 1972, 1973, or 1976.”

⁵ 由何雄文 (Professor Antonia S. Cua) 主編，Garland Publishing 出版。

⁶ 這個月、日的細節，張耀南和左玉河兩人所提供的仍然有出入。我傾向於取左玉河的說法，詳下文。

並從中提供一些顯著的例子，以說明若根據不足，則事實的真相還是真不容易弄明白。在真相不完全明白前，存疑還是上策。在這點上，我覺得羅素的建議最可取。他說：「我所主張的懷疑論總括下面三點：（一）當專家們同意時，反面意見不能被視為不能成立；（二）當專家不同意時，非專家不能為沒有意見；（三）當專家對正面意見提出不足夠的理由時，一般人大可以懷疑其判斷。」⁷

就我所見的資料中，謝扶雅的〈懷念張東蓀先生〉⁸是探討張東蓀生卒年的好起點。在此短文裡，謝氏提到張東蓀幾乎所有可能的出生日期，即 1883、1884、1886 和 1889 年，同時也對張東蓀的卒年做了有根據，具權威的推測。其實謝扶雅的〈懷念張東蓀先生〉一文對張東蓀的生卒年疑問所提出的歷史事件和歷史解釋有相當清楚的描述。

謝扶雅的〈懷念張東蓀先生〉，發表於 1976，是中文著作中對研究張東蓀的入門者極有用的文字，分三部分，處理三個重要問題：(1) 東蓀生卒年之謎；(2) 東蓀當年何以不曾離開大陸？(3) 東蓀的哲學思想。我們在這裡只集中討論第一個重要問題，雖第二、三個重要問題對解釋張東蓀卒年無法解決的歷史解釋也有助益。謝扶雅在文中提出「東蓀生卒年之謎」時，寫道：

據好幾種近代中國名人錄（英、日文的），關於張東蓀的生年頗相歧異；或說在一八八六年，或說是一八八三或八四。照張君勳先生生前給我的一封信中，稱「賤辰丙戌十二月廿五日，東蓀比我大數月」云云。按光緒十二年丙戌，即為一八八六年。但君勳出生的農曆十二月廿五日，已是陽曆一八八七年一月。東蓀比他大數月，則兩人因同屬光緒十二年，但就陽曆來算，則君勳已進至一八八七，而東蓀仍留在一八八六年。惟據東蓀在北平燕京大學的多年同事洪煨蓮（業）教授最近致我的手札，說東蓀和他於抗戰期間，同繫北平日本憲兵司令部獄中時，親口對他說，自己比他大十歲。按洪煨蓮生於一八九三年，

⁷ 羅素原著，楊耐冬譯，〈懷疑論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95年再版），頁8。

⁸ 〈傳記文學〉，第29卷第6期（1976.12）。

是則東蓀生年應爲一八八三或八四了。⁹

於此即可見張東蓀生年的三種可能性是 1886 年，1883 年，或 1884 年，它們皆有權威性，因爲張君勳和洪煨蓮皆爲張東蓀的知交，其中 1886 年的來源是張君勳，1883 年的來源是洪煨蓮。針對這兩個權威互相抵觸、矛盾的說法，謝氏也無所適從。謝氏（他本身也是張東蓀的知交）自己的思路或尋求個中答案的過程是這樣的：

我們從未看見或聽過東蓀曾寫出自傳或回憶錄之類（他陷身中共大陸時期如何，有無遺稿及此，今自無可查知）。我閱及今年在美出版的《燕大校友年刊》，其中有一自稱爲東蓀門人的陳熙稼者，撰寫了〈憶燕園諸老〉一文，敘述他親炙而亦十分親暱的老師「張東蓀先生」一則，稱道其學志節行誼頗詳，卻完全沒有提到東蓀先生的生卒年代。我曾進一步詢問這位住在美西的作者，特別問他「貴業師」在故都生死存亡的消息，竟然月餘沒有得到他的回音。我又向燕大年刊的編者徐兆鏞君（亦寓美西），經其就近電話詢問，結果推說「可問諸洪煨蓮教授」。但煨蓮先生回我的信中，只說彷彿有人曾告訴過他，東蓀已早去世，可惜已不記得是何年了。¹⁰

現在我們知道張東蓀有寫自傳，但已沒有留存，而下面也會提到洪煨蓮認爲張東蓀是死於 1968 年。謝文曾就張東蓀的卒年向張君勳等人請教而不得要領：

燕大故校長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傅涇波氏（今寓華府），曾於數年前赴大陸探視故友，回美後，在覆我的一函中，提及東蓀早於一九六二年在平物化。我對此說，不無疑異。六十年代，君勳在此，與我頗多往來，從不聞其說起此一老友之已不在人間。而況東蓀友生今在台港及海外各地者應不云鮮，何以各方面的書報刊物，一直未見有任何悼念追憶的文章？而一九七〇年及其前出版的中國名人錄等書物，都不

⁹ 同上，頁 91。

¹⁰ 同上。

見登載東蓀的卒年。與東蓀之情況極相類似，同陷大陸的學人如梁漱溟，常自鐵幕內透露出一些信息，知其雖尚生存，然已等於幽禁。獨於張東蓀的消息竟是唯一的例外。料想他多半歸道山，恨無從確知其為何年，怎不令人納悶呢？

謝氏當時不能回答的張東蓀之卒年的問題，並非偶然，因為迄至 1973 年上半年，甚至連張東蓀家人也同樣無法解決，因為個中涉及極複雜的政治迫害。我們在下面會談到。現在先繼續談在這問題水落石出前的一些不確定或錯誤說法。¹¹

張君勳寫於 1965 年 5 月的〈張東蓀八十壽序〉¹²是二張（張東蓀、張君勳）關係和研究張東蓀的重要文章，也可能是謝扶雅提出張東蓀生卒年疑問的所參考的文章之一。

張君勳在這篇極感人的追憶文字裡寫道：

是則二十世紀中葉之今日，吾人丁宗邦淪陷，顛沛流離，不遑啓處之會，其於故國親舊，求自由往還不可得，求握手言笑不可得，乃至求書札候問亦不可得，第乃於其誕日，遠隔海天，文而壽之，以追平生之歡，訴隔絕之痛，而達衷曲之私，蓋亦心聲所不能已而大雅之所不廢者乎！¹³

張君勳接著回憶他們兩人最後一次聚散的原委，以及一個滯留大陸，一個流亡海外，不能再見面的感懷，並做一個總結：

其後、政府遷都，制憲行憲會議次第舉行，本黨部份同志參加政府，以示合作之誠。而東蓀鑒於國共和談之破裂，和平統一之不易，始毅然認本黨與政府合作之非計，亦即與余共學共事數十年而分道以馳之始。又其後，大陸淪陷，極權虐政，毒流人神。而余顛沛海外，皤然

¹¹ 同上。

¹² 本文原刊《自由鐘》卷 1 期 3（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亦載《徵信新聞報》，1965 年 6 月 2 日，第二版。謹此謝謝黎漢基博士提供此資料；《再生》（重刊），卷 1 號 9（1971·9·15）；後收在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二冊）（台北：學生書局，1981），下冊。今引自後者。

¹³ 《中西印哲學文集》，下冊，頁 1402。

已老。既傷祖國，復念故人。緬懷昔遊，都如隔世。是為余與東蓀一散不可復聚，將且人天永隔，長無見期，黯然而歎之始。嘗聞之北來友人：東蓀初曾以調停傳作義功，得為中共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乃不知何故，不旋踵亟解其教職；又不旋踵復撤其委員。今則軟禁寓中，並行動自由而亦喪失……¹⁴

接著張君勳在確不知張東蓀是否已作古的情況下，道出交往不可得的無奈：

乃吾人今日破國亡家之餘，並欲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一二素心人亦不可得！則余之念東蓀，寧有盡耶！昔老杜送孔巢父詩有曰：『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今日誰復能為余之巢父，足任問訊之勞者耶！而余與東蓀當年攜手一堂，上下議論之樂，寧可再得於今生耶！¹⁵

張君勳上文，寫於文革即將爆發的前一年。文革是使有關張東蓀消息更加混淆的年代。但早在五〇年代初起，張東蓀已是被批鬥的對象。我在博士論文已略有提及。今參照後來的一些閱讀加以補充如下，以說明政治迫害之危害研究。

中共於 1949 年初佔據北平後，張留在那裡並參與新政府之建立。在燕京，他和比較年輕的學術人員，緊接著幫忙大學當局過渡到 1949 年以後的新秩序。過渡階段的第一高潮是燕京學人中的九位教授被邀為成員參加於 1949 年 9 月 21 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委員會，並核准成立新政府的共同綱領。被邀的九人中，除了翦伯贊，沈志遠外，就是宗教系的趙紫宸、哲學系的張東蓀、社會系的嚴景耀和雷潔瓊、來自杭州大學教育系的新教授林漢達、音樂系的新教授馬思聰，和以特別邀請成員身份參加的陸志韋。¹⁶

¹⁴ 同上，頁 1404。

¹⁵ 同上，頁 1405。

¹⁶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95, 203-204;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在新政府成立後，張被委為中央人民政府議會的成員，和一大堆職位（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他以主要調解人之一的身份成功地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了保衛北平的傅作義的軍隊和攻擊他們的共軍部隊間的可能的衝突）直到 1952 年春天，他終於被批鬥為止。¹⁷

先是自 1950 年以來，張氏繼續保持其獨立的作風，使他與共產黨要對中國學術人員進行意識形態動員的計畫相衝突。當他愈來愈對中共的獨裁表示批判時，他終於在 1950 年被指控通敵與叛國罪，這明顯是指他與美國的關係。在 1951 年的冬天和 1952 年的春天，由共產黨發動、與「三反運動」（即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相關連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參與改造的一百一十位燕京學術人員中，大部分都能在幾個星期內在其個別的小組裡，提出可被接受的自我批評。到了 1952 年 3 月，有二組人發現他們的自我批評不被接受，因而其案子得提到大型的會議上。第一組的人包括從事中層行政任務的學術人員，以及那些曾經反共的人。第二組的人，比較重要的一組，包括三人，即張東蓀（他於 2 月 29 日被批鬥）、趙紫宸（他於 3 月 10 日被批鬥）和陸志韋（他於 3 月 11 日被批鬥）。¹⁸

張氏那時是哲學系主任。在那天，他出現在全燕京教員、學生、職員和工友的會議前，做進一步的自我批評。他被指稱在約十年前曾寫道：「如有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 (5 Vols.), Vol.1,p.133.

¹⁷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1,133;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n.d), p.38; *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Modern China*, pp.159-160.

¹⁸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p.159-160.請參閱沈育光：《我所見的靠攏人物》（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年再版），頁64：「去年春天『三反』時，張被中共部份幹部大肆攻擊，同時燕京大學學生會，在北平市內也散發了數萬份傳單，說張東蓀受過美國人的津貼，一向是走中間路線的投機份子，請求政府把他撤職查辦。這一鬧，轟動了整個北平城，張於嚴重的打擊下，即向府委會寫了檢討書舉行坦白，可是他的坦白與檢討書內，沒有詳細說明是否受過美國當局的津貼，經過中共製造的連續打擊，張在無可奈何下，只得將過去受過美國人津貼等情形一一坦白交代出來，始獲毛澤東周恩來的諒解，這一場風波，才算平息。自此，張精神上受了深刻的刺激，終日愁眉不展，喃喃自語，有如神經病一樣，這是投機靠攏者的遭遇，當然，他的結局和未來的命運，恐怕更悲慘呢。」

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于選擇槍斃與絞刑。」¹⁹但張之「真正罪狀」極可能即是毛澤東於 1952 年 4 月 21 日「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簡報的批語」所透露的：

彭真（原註 1）同志：

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原註 2），像周炳琳（原註 3）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作法（原註 4）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許多反對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作法。²⁰

該資料所附的各註內容是這樣的：（原註 1）：『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原註 2）：『張東蓀，原為燕京大學教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抗美援朝時，因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委員職務，但從寬處理，不逮捕法辦，並照發工資。隨後民盟中央決定開除他的盟籍』；（原註 3）：『周炳琳，當時擔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原註 4）：『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日報送毛澤東並中央的北京高等三反簡報中說，為了幫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對思想改造的顧慮和端正對三反的態度，北大黨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派人同他談話。在張奚若、馬寅初同周談話和周的女兒

¹⁹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1, p.133;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pp.38,39;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243.註中所指張氏反共之事實，可參照 *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Modern China*, p166: "Sometimes in the 1930s the Yenching students asked Chang to write an inscription for the school paper, a common practice in China. Chang wrote: 'If I were given a choice between communism and the guillotine, I would choose the latter.' His anticommunist attitude, although strong, was mainly intellectual....." 若非此段引文作者誤譯，則可能另有出處，因它與數種研究所談的事實在內容上有相當大之差異。就本文作者所知，本註中其他作者所談的事實可能是指正文中所引的句子。該句子實際上見於《唯物辯證法論戰》之內頁，乃張氏手抄並小改自該書附錄中之一篇題為〈我所以不做共產主義信仰者的理由〉的文章。此文原是英文稿，乃 Morris Cohen（柯亨）所寫，中譯者署名「訪賈」。

²⁰ 毛之評語，載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1952年1月—1952年12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422。謹此謝謝同事翟志成博士提供此則重要資料。

（共產黨員）做工作後，周的態度有所轉變，表示願意聽取大家的批評，進一步作思想檢討。」²¹

從此項資料中可見清楚看出：(1)整肅張東蓀是中共爭取、改造所謂反動或中間派教授們的必要作法；(2)所謂思想改造和三反運動皆為中共一手策畫的；(3)毛澤東的批示等同法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可以決定從寬處理所謂叛國罪。

張氏接著被革除其在學術和政府裡的職位而失去其在全國的聲望。儘管他們渡過三反運動得涉及心身上（無限的）折磨，陸、趙和張仍被允許住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並定期領到薪水。他們從未被監禁，但至少一時他們是被孤立了。²²這種方式的處分，是張所無法忍受的。²³儘管他受到屈辱和批判，他顯然並沒有向中共屈服，因為有報導說在 1957 年的『整風運動』期間，他又因『站在民盟要人羅隆基一邊』而被批判。²⁴張於文革前尚能保有一命，但在文革期間他終於無法免於浩劫，即使毛澤東不想致他於死地。²⁵這是個更加驚心動魄、家破人亡的大慘案。下面會特別提到。於此只要強調，經過一系列整肅後，有關張東蓀的消息即更不容易確實，甚至連傳聞都渺茫，各家只好各顯神通蠱測。至到八十年代，張中行在《月旦集》中還寫道：『大概是七十年代末期，有一天，在燕園東門外，即蔣家胡同西口，我買食品，看見張先生的女兒。她是我的學生，約三十年不見，仍是那樣清瘦，也許有什麼事，眼直視前方，走得很快。我先是想攔住她，但只是一閃，就想到一言難盡的種種情況，還沒來得及決定怎樣辦，看看，她已經走

²¹ 同上，頁 422-423。

²²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1, p.133;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p. 39;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243.

²³ 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觀察社，1948年），頁 87。

²⁴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p.38. 本文作者於檢讀 1949 年至 1963 年間之相關目錄時，只看到一篇直接批評張東蓀的文章，即陳先達的〈批評張東蓀的哲學思想〉，載於《教學與研究》，第 11 期（1956），頁 13-33。該文批評張氏反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並且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相混淆。該文作者也說：由於張的階級性，他是反對歷史唯物論的。

²⁵ 參見註 3。

進燕園東門了。就這樣，同張先生的情況的消息也最後告別了。』²⁶『再其後，我精力日下，在門內比在門外的時候多，閉眼比睜眼的時候多，以致直到現在【八十年代初】，對於張先生的桑榆晚景，還是一無所知。不知道也好。這次是因孔北海之介，又想到他，並聯想到生存與說話的關係問題。他還健在嗎？依照自然規律，可能性不大了。若然，那他就可以不費力而沉默，安息吧！』²⁷於此可見張東蓀的晚景的確不易弄清楚，而他的家人則避而不與熟人見面，甚至連師生間的问候都在避免之列。參照如下數行與張東蓀有密切交往的人的死亡報導即可知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非共、但同情共黨人士，而在中共統治仍然是保持其身分或加入共黨而後被批斗、整肅人士的死年確不易確定。胡志偉 1986 年 11 月 9 日寫道：『從大陸【來】的消息說，反右前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是七十年代中葉不堪「窮追猛打」而跳海自殺的。』『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等人的死訊是在「文革」後期中共編印《毛選》四卷註釋本時披露的，可是儲安平的下落一直諱莫如深，蓋因儲安平的「黨天下」三字踩中了共產黨的痛腳，成為共產獨裁統治的鮮照，所以中共歷屆領導人，自毛澤東、華國鋒至今日的鄧小平，都不願饒恕他。』『儲安平在大陸陷共前主編《觀察》雜誌，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他由各附共黨派的推舉，主持《光明日報》的編務。』²⁸

若儲安平自殺於七十年代中葉得等到八十年代中葉才真相大白，而章伯鈞、羅隆基等人的死訊反得在《毛選》中披露，則我們對以下更早的，或海外的有關張東蓀卒年的記載有錯誤也就容易理解。

著名哲學史家陳榮捷在他 1963 年出版的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²⁶ 張中行著、徐秀珊編，《月旦集》（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5 年），頁 74。此書中有關張東蓀的文字，前已收在氏著，《負暄續話》（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 版）。

²⁷ 同上，頁 74。本文作者於八十年代曾在海外遇到張東蓀鄰居（他們的父親皆為張東蓀很熟的同事或同行），並詢問過他們關於張東蓀晚年，但皆不得要領。

²⁸ 胡志偉編著，〈儲安平死因終大白〉，《中共文化百人志》（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9 年），頁 251。〈儲安平死因終大白〉一文原載 1986 年 11 月 9 日的《快報》（見《中共文化百人志》，頁 253。）

Philosophy (《中國哲學文獻選編》) 的第一次印刷中沒有提及張東蓀的卒年，但有提及他的生年，而且不只一個，而是二個，分見該書所附 *Chronology of Philosophers* 的 1887 年 (頁 xii) 和 1886 年 (頁 744)。這種不一致的生年說法，至遲到了該書第一版的第四次印刷時 (1973 年) 已改正為正確的 1886 年。但可惜的是，陳氏在訂正了此錯誤的同時，卻也加進了張東蓀卒於 1962 年的錯誤說法：

張東蓀，浙江人。有人說他生於西元一八八四年。他並非如傳聞說的曾就讀於東京大學，不過他的確在日本待過一段時間。也做過許多報社和雜誌社的編輯，在上海與廣州做過大學教授，之後他是北京燕京大學的教授。原先，他是進步黨的領袖，後來為國社黨的黨魁，因此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對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北京被日本人逮捕下獄。戰後，他脫黨，另參加在北京的左翼民主同盟，一九四九年成為北京政府的中央委員，不久即退隱，卒於一九六二年。²⁹

至遲到 1973 年，陳自己的看法是張東蓀的生年是 1886，而卒年是 1962。³⁰這也是我曾取用的看法，其中關於卒年的說法，在我研究張東蓀的初期是我所見和謝扶雅的文字一樣好的證據，但現在證明是錯的，雖然陳氏確曾做了些求證。此外，張東蓀告訴我們他從未曾是進步黨人，雖他的朋友

²⁹ Chan Wing-tsit(陳榮捷) trans. and comp.,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th Printing, 1973), p.744: "He was a native of Chekiang. Some say he was born in 1884. He did not study in Tokyo University as sometimes stated but did spend some time in Japan. After serving as an editor of variou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as a university professor in Shanghai and Canton, he became a professor in Yenching University in Peking. Originally a leader of the Progressive Party, he later became a leader of the State Socialist Party and as such was opposed to both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imprisoned by the Japanese in Peking. After the war he left his party and joined the leftist Democratic League. In 1949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in Peking. Soon afterward he retired. He died in 1962." "He died in 1962." 一句為此書第一次印刷時所無。此書相關中譯文見陳榮捷編著，楊儒賓、吳有能、朱榮貴、萬先法譯，黃俊傑校閱，《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二冊（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頁 872。以上引文轉引自後者。

³⁰ Chan Wing-tsit(陳榮捷) trans. and comp.,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th Printing, 1973), p.xvii 和 p.744.

中有許多人是此黨人士。又據最新左玉河的看法，張東蓀確曾留學東京大學讀哲學，且於 1911 年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進士。³¹

另一對張東蓀生卒年和生平有相當陳述的是上面已提到的 Wen-shun Chi (紀文勛)的 *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Modern China* 一書。此書除了在頁 157 裡正確指出張東蓀的生年外，是在頁 160 上說，張大概是死於 1976 年，享年九十。這個有關張東蓀卒年說法涉及張東蓀所享的年限最長。這對我們研究者而言是壞消息，因為我們得留意他此期間的發展，而對張而言，則是災難，因為他得經歷人類史無前例的思想大浩劫，我想張是不會不願意早點死！否則他就得忍受他大概無法忍受之精神折磨。

紀文勛的英文著作 *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Modern China* 已有中譯本。³² 從書名可見其重點所在。此書列出作者認為在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即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胡適、張君勱、張東蓀、梁漱溟、陳獨秀和毛澤東共九人各立一章加以討論。就張東蓀這章而言，作者先介紹張東蓀的生平，主要根據的是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中 “Chang Tung-sun” 一文，但也加上了一些新材料，如說張東蓀死於 1976 年這個新穎的說法，以及主要根據張東蓀的五本書³³中的傳記文字而補充張東蓀的生平。

我們在談謝扶雅的文章時已提到洪煨蓮（洪業）。在《洪業傳》（頁 257）裡可以看到如下有關張東蓀卒年的推測：

當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漸漸被揭露後，死訊頻頻傳至。其中陸志韋死得最慘。共產黨上台時他是燕京校長，一九六八年陸志韋被毒打得神志不清，然後被關到一個昏暗的屋子裡半年，在自己的糞尿中渡日。被釋後他重病，沒受醫療而死。

張東蓀則在監獄裡上吊自盡。³⁴

³¹ 左玉河，《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5），頁 10，20。

³² 程農、許劍波譯，《現代中國的思想衝突——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³³ 即《道德哲學》、《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³⁴ 陳毓賢，《洪業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頁 257。

從文中推斷，好像是說張亦死於 1968 年，但亦可說是文革期間。現在已知皆非事實。弔詭的是《洪業傳》出版於 1992 年。我們或會問，為什麼沒有改正呢？其實我們不必感到驚奇，顯然洪業不是故意不改，而是沒有正確的事實可以為依據，以下的數條可為證。

（一）、1983 年，劉建國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要》上寫道：『張東蓀（1884-1973），字聖心，江蘇吳縣人，生于光緒十年，卒於 1972 年。』³⁵此資料不但關於張東蓀的生年是錯誤的，而且令人費解的是在同一行裡居然有二個卒年，互為矛盾！

（二）、1984 年，呂希晨、王育民在《中國現代哲學史》裡寫道：『張東蓀（1887- 1972）浙江杭縣人。』³⁶此資料的生卒年亦皆誤。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年後，其中一位作者（呂希晨）再提及張東蓀的生卒年時（見下敘），終於改正了錯誤。可見事實有時會得到澄清，因而解決了疑案。

（三）1989 年，忻劍飛、方松華編的《中國現代哲學原著選》有云：『張東蓀，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杭縣人（今杭州市）。生於 1887 年…… 1973 年病逝於北京。』³⁷此資料關於張東蓀的生年同上述《中國現代哲學史》，以及下述《文史哲學習辭典》和《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同樣，誤以為是 1887，使人懷疑是否後出版者轉引自前出版者，以訛傳訛，或是相關作者的確無法解決相關問題。

（四）1989 年，李盛平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裡寫道：『（張東蓀（1886-1973）浙江杭州人。』³⁸這是正確的報導。

（五）1990 年，蔣錫金在他主編的《文史哲學習辭典》裡寫道：『張東

³⁵（7）劉建國（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要》，（二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頁 704。

³⁶ 呂希晨、王育民在《中國現代哲學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第一版），頁 235。

³⁷ 忻劍飛、方松華編，《中國現代哲學原著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頁 325。

³⁸ 李盛平主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頁 354。

蓀（1887-1972）』。³⁹此資料生卒年皆誤。

（六）1990年，張儒義在《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裡寫道：「張東蓀（1887-1972）浙江省杭縣人……」⁴⁰生卒年皆誤，與《文史哲學習辭典》完全一樣。

（七）1990年，張敏孝寫〈張東蓀（1887-1973）〉一文。⁴¹生年誤，與《中國現代哲學原著選》一樣。

（八）1991年，李華興、陳旭麓主編的《中華民國史辭典》有云：「張東蓀（1886-1973）浙江杭縣（今餘杭）人。原名萬田，字聖心。早年留學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1973年6月病逝於北京。」⁴²此生卒年資料是正確的。

（九）1995年，方克立、王其水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哲學》有云：「張東蓀（1886-1973），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字聖心，浙江杭州人。」⁴³我們發現上述文字是呂希晨所寫，因此可見呂氏終於改正了他以前數度所提的不正確的張東蓀生卒年。這是事實真相大白後，學者會澄清記載的好例子。

以下接著談只記載張東蓀的生年的資料，從中可見其生年記載的誤差遠比卒年少。

（一）1918年12月1日出版，天南田原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裡說張東蓀那時三十一歲，推算下來，他的生年是1886。⁴⁴

（二）1933年2月13日出版的《國聞週報》說他「現年四十七歲。」⁴⁵推

³⁹ 蔣錫金主編，《文史哲學習辭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5），頁1005。

⁴⁰ 張儒義，《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7），143。

⁴¹ 見《中國民主革命時期人物簡介》第232頁。此處轉引自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著，《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頁1093。謹此謝謝同事李達嘉博士借閱此索引資料。

⁴² 李華興、陳旭麓主編，《中華民國史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70

⁴³ 方克立、王其水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第二卷：人物志，二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頁91。

⁴⁴ 此書目前有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重印本。此處資料可見該書頁437。

⁴⁵ 《國聞週報》（天津國聞週報社，1933），第十卷，第六期。

算起來，就是 1886 年。這個生年是正確的。

(三) *The China Year Book, 1934* (《中華年鑑》) 說他生於 1886 年，是浙江嘉興人 (native of Kaishing, Chekiang)，東京帝國大學畢業。⁴⁶

(四) 1936 年出版的 *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只說張東蓀生於 1886 年。⁴⁷ 這個生年是正確的。

(五) *China Handbook 1950* 亦重覆以前 *The China Year Book* 的報導。⁴⁸

(六) 1954 年出版的 *Who's Who in Modern China*，說於 1886 年他生於浙江杭州，東京帝國大學學士。⁴⁹

(七) 1956 年，O. Brière, S. J. 在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98-1950* 裡的張東蓀生年也是 1886 年。⁵⁰

(八) 可能是 1950 年代出版的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說他生於 1886，另一說法是生於 1889 年，浙江杭州人，東京帝國大學畢業。⁵¹

(九) 由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 (5 Vols.), Vol.1, pp.129-34 裡 "Chang Tung-sun" 這一目下只提供張的生年為 1886，而無卒年 (p.129)。這可理解為是不確定，或不知道。

(十) 1978 年，張朋園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裡提到張東蓀的生年為 1886 年，而對於卒年存疑。⁵²

(十一) 1984 年的《中國新聞年鑑 (1984)》有〈新聞界名人介紹：張

⁴⁶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34* (《中華年鑑》) (Nendeln: Kraus-Thomson Organisation, 1969 Kraus Reprint), p. 666。

⁴⁷ *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Shanghai: The Chinese Weekly Review, Fifth Edition, 1936), p.16.

⁴⁸ The China Handbook Editorial Board, comp. *China Handbook 1950*, (New York: Rockport Press, 1950), p.733。

⁴⁹ Max Perleberg, *Who's Who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Ye Olde Printerie, 1954), p.16。

⁵⁰ O. Brière, S.J.,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98-1950*, trans. by Laurence Thomps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6), p.149。

⁵¹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n.d.), p.38.

⁵²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處出版社，1981年再版)，頁 267。

東蓀（1887-）一文⁵³，從中可見張東蓀生年為 1887 年。這個說法，一反早期正確的說法，反而提供錯誤的生年。

（十二）1992 年，黎建球在《中國一百位哲學家》裡只寫道：「張東蓀，生於光緒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⁵⁴

四、張耀南與左玉河對解決張東蓀生卒年之貢獻

張耀南的著作是我們了解張東蓀生卒年最重要的二個例子之一。另一個是左玉河的著作。張耀南編的《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出版於 1995 年 10 月 1 日出版。書中有一篇張耀南寫於 1994 年 1 月 14 日的前言。前言中張氏寫道：

張東蓀出生於一八八六年。他的出生地一說是在浙江杭縣（今餘杭），一說是在江蘇吳縣（蘇州）。據他的孫子說，應該是後者。他的父母是浙江錢塘人。」⁵⁵

揆諸於下面提到的左玉河更新的研究，上述據說張東蓀的出生地果然是不正確的。在這段文字之前二段裡，張耀南寫道：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以後，沙灘北京大學遷進燕京大學校園，燕京大學消失，張東蓀於是成為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五八年被迫辭去教授職務，調北京市文史館做勤雜工。同時被趕出原住地——北大朗潤園 178 號。在做了十年雜務以後，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八十歲的張東蓀被投進監獄，從此沒能再出來。⁵⁶

以上提到張東蓀被關進監獄的說法現在證實也是錯誤的。接下來張氏下結論說：「張東蓀一生都在為維護「說自己的話」的權利而努力。當這種努

⁵³ 見《中國新聞年鑑（1984）》，第 666 頁，此處轉引自《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頁 1093。

⁵⁴ 黎建球，《中國一百位哲學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年四版），頁 361。

⁵⁵ 張耀南編，《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10·1），前言，頁 3。

⁵⁶ 同上，頁 2。

力終於沒有結果時，他便不再說話。他沉默了整整二十多年，直到死去。』

57

這裡的二十多年不太確定，到底是從 1952 年算起，還是從 1968 年算起。若是 1952 年算起才有二十年以上可談，而若是 1968 年算起，則只有五年可談，因為張耀南告訴我們張東蓀死於 1973 年。因此迄至 1994 年 1 月 14 日張耀南仍不知張東蓀的真正卒年月日。張耀南也告訴我們：

張東蓀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張宗炳，生物學家，一九六八和張東蓀同時入獄，一九七五年出獄，出獄後精神失常；次子張宗璿【左玉河的資料是寫成張宗燧】，物理學家，一九六九年吃安眠藥自殺於北京；三子張宗燦【左玉河的資料是寫成張宗穎】，曾研究化學和社會學，一九六六年和妻子一起雙雙上吊自殺於天津；么女張宗燁，物理學家，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⁵⁸

這裡只提到張宗璿【燧】自殺，而沒提及其夫人亦自殺。這與下文說張宗璿【燧】夫婦皆自殺不一致。

張耀南寫於 1995 年 5 月 17 日，並於 1995 年 12 月出版的《張東蓀知識論研究》除了完全重述上述他自己關於張東蓀生年和出生地以及文革期間被投進監獄的看法外，還加進了張東蓀的卒年、月、日和死地：

張東蓀在北京昌平秦城監獄死去，是在一九七三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59

可惜這兩個分別關於張東蓀的死地和月、日的珍貴資料也是錯的。和他上述在八十年代認為張東蓀是生死不明有所保留看法對照，張中行在 1997 年出版的書中也認為張東蓀死於監獄。他在《流年碎影》裡寫道：『有時我想到也同我熟的張東蓀先生，始建國，他高升為政府委員，時間不很長就跌下來，到大革命時期，由海淀成府的平房小院遷往監獄，終於在那裡見了上帝。張先生心直口快，慣於或者喜歡露鋒芒，因而就失之世故太少，以致不

⁵⁷ 同上，頁 3。

⁵⁸ 同上。

⁵⁹ 張耀南，《張東蓀知識論研究》序（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5.12），頁 1。

能適應新形勢，坎坎坷坷離開人世。』⁶⁰

以上張耀南同樣錯誤的內容亦見他寫於 1997 年 9 月 28 日凌晨四點四十分，出版於 1998 年 8 月的《張東蓀》。在《張東蓀》裡張耀南告訴我們：『清光緒十二年(1886)，丙戌，0 歲 先生生於江蘇吳縣(今蘇州)。先生名東蓀，字聖心。父簡松先生。祖籍浙江錢塘。』⁶¹『在目前尚存的文字中，東蓀先生很少提到，也沒有機會提到自己的童年。』⁶²『東蓀先生的幼年應該是在蘇州度過的，因為蘇州是他的出生地。東蓀先生的父親，原是浙江錢塘人，因為做官才到了蘇州(原名江蘇吳縣)，並在蘇州生下東蓀先生。』⁶³

在同書頁 82 的一個註(註 5)裡我們看到張耀南並沒有改變在《張東蓀知識論研究》裡已提出的錯誤看法：

(5)從被控犯有重大叛國罪到病死北京昌平秦城監獄(1973)為第五期，64-87 歲，為學術沉默時期。此時期亦可分為兩截，1950—1968 年為一截，東蓀先生失去各種社會任職，公民權，教授職務等；1968-1973 年為另一截，東蓀先生不僅失去思想自由，著述自由和言語自由，而且進一步失去人身自由(或曰肉體自由)。⁶⁴

同樣的內容亦見同書他處：『一九七三年，癸丑，87 歲。是年，先生病死北京昌平秦城監獄，未經審判，未作結論。』⁶⁵

以上張耀南的研究成果，與左玉河在同樣的研究中所提供的極珍貴照片，以及同樣多，甚至更多，第一手訪談消息和張東蓀著作一對照，我們不得不說左玉河的研究至少就本文所興趣的問題之解決而言，是更全面解決了疑問。無可諱言，張耀南的研究是迄至左玉河的研究出版前研究張東蓀最有分量的中文著作，是十分值得慶賀的。張耀南對自己的成果表示自豪是可以

⁶⁰ 張中行，《流年碎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5)，頁 349。謹此謝謝同事翟志成博士提供此資料。

⁶¹ 張耀南，《張東蓀》(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8)，頁 405。

⁶² 同上，頁 2。

⁶³ 同上。

⁶⁴ 同上，頁 82。

⁶⁵ 同上，頁 437。

理解的。⁶⁶我們在感謝張耀南的三本書時，也不妨，且已指出他的著作中關於張東蓀死因和月日的錯誤，因為我們現在有了更新，且證據和理由更確鑿的左玉河的研究。

左玉河在1998年5月出版的《張東蓀傳》裡寫道：

1886年12月9日（光緒丙戌十一月十四日），張上龢的第四子出生，這便是張東蓀。張東蓀，原名張萬田，字聖心，是張家「田」字輩。「東蓀」是後來他自己取的名字，意為東甫公的孫子，表示對祖父為人與功業的敬仰。張東蓀出生於直隸其父親剛剛赴新任的內邱縣。童年時期的張東蓀似在北方內邱、靜海等地縣衙中度過的。⁶⁷

左玉河所提供的張東蓀出生月、日；「東蓀」由來，是張耀南沒有提供的消息；此外說張東蓀生於直隸等，則是與張耀南等大多數人所採說的，張東蓀生於蘇州的說法不同。能夠如此詳細道來，我們做為讀者最直接的反應是這大概是有根據的，且沒有理由懷疑，也就是說其為真的可能性極高。此外，它與以上任何資料比，都是最新且最權威的。最重要的是它能解釋上述種種矛盾說法的由來，並一一加以克服。

對張東蓀死因之謎以及各種說法出現的背景左玉河也做了詳細的交代，很值得引用、參考：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東蓀敏感地意識到不僅國家的災難到了，而且個人的厄運也降臨了。當他見到過去中共的一大批老幹部都被打倒後，便將自己晚年所寫的未完成的自傳《我與政治》、一部快完成的小說手稿及詩詞集《草間人語》都燒掉了。但他寫「自傳」的消息已還是為人所知，並很快被抄了家。抄家者對張東蓀家進行了非常認真的搜查，並將張東蓀保存的手稿、字畫及晚年所寫的文字統統抄走。抄完家後，有一摺張東蓀所寫的詩詞因裹在幾張舊《人民日報》中，沒有被抄走，張東蓀的夫人吳紹鴻立即將它燒掉。⁶⁸

⁶⁶ 《張東蓀》自序。

⁶⁷ 左玉河，《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5），頁4。

⁶⁸ 同上，頁446。

以下是左氏對張東蓀於 1968 年被帶走一事的解釋：

1968 年 1 月，突然有一些人來到張家，將張東蓀和他的長子、著名生物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宗炳一起帶走。此時，張東蓀已經是 80 多歲的老人了，為什麼還要逮捕他？可能與當時揭發批判中共北平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徐冰有關。這似乎可以從葉篤義的被捕與審訊內容中看出些端倪。⁶⁹

1968 年 1 月初，中央統戰部有人到民盟找葉篤義調查材料，除了調查張東蓀與蔣介石、司徒雷登會談的情況外，還反復詢問了張東蓀在北平與軍調部中共方面的人接頭的情況，並問有沒有關於徐冰的審情。4 月上旬，同一批人逼葉篤義寫下「張東蓀是一個美國特務，我在解放前曾長期爲他服務，因此我通張東蓀也是一種特務關係」。接著連續五次審問葉篤義，告訴說：「張東蓀已經逮捕入獄，對你進行了揭發。從你同張東蓀的關係來看，他對你的揭發當被認爲是有分量的。」4 月 26 日，葉篤義正式被捕，押到秦城監獄。經過反復的審訊，8 月 24 日，葉篤義被迫招認：「承認了我同徐冰之間的特務關係是張東蓀介紹的；我把徐冰提供的情報轉報給司徒雷登和張東蓀，我們之間形成了一條特務線。最後寫爲「張東蓀把我的政治身分告訴了徐冰，接頭後我和徐冰發生了特務關係。」……⁷⁰

張東蓀被捕後的情況現在還無從知曉，但從葉篤義在獄中的審問情況看，張東蓀的被捕顯然主要是由於徐冰案件的牽連，是有人想讓張東蓀和葉篤義等人揭發徐冰做「特務」的黑材料。⁷¹

以徐冰案件來牽連張東蓀是在算舊帳。張東蓀早在 1950 年代初已被定讞爲叛國罪，且已得到最高權威毛澤東親自的寬恕，何以又因同一罪狀而遭第二次殃？看來中共政權的司法，更不要說黨政機構是不講不二度審訊 (double jeopardy) 的道理的。在法律上，被告若因「同一案件曾被開釋」

⁶⁹ 同上。

⁷⁰ 同上，頁 446-7。

⁷¹ 同上，頁 447。

(Autrefois acquit)或因「同一案曾被定罪的抗辯」(Autrefois convict)一成立則不能再受處置。⁷²但我們確發現不但張東蓀再受審訊，且其家人更株連累累：

張東蓀父子被捕後不久，他的次子、著名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張宗燧【張耀南的資料是寫成張宗璿】夫婦，他的三子張宗穎【張耀南的資料是寫成張宗燦】夫婦都先後自殺身亡。張東蓀一家遭受了一場罕見的浩劫與災難。在很長時間內，張東蓀的家人不知他們父子的下落。但張東蓀的夫人吳紹鴻女士始終沒有放棄尋找他們的努力。直到 1973 年上半年，她終於打聽到張東蓀父子被關在秦城監獄。當吳紹鴻與張宗炳夫人劉拙如女士一起去探望時，只見到了張宗炳，而沒有見到張東蓀。此時，張宗炳因無法忍受孤獨的監獄生活，精神已經失常，患有嚴重的精神病，根本不認識自己的母親和妻子。她們兩人傷心而回……後來，張東蓀的家人了解到張東蓀父子被捕後，並沒有關在一起，張東蓀一直關在北京復興門鐵道醫院，一面審問，一面治病，生活上也沒有受太多的苦。1973 年 3 月，吳氏終於在復興門鐵道醫院見面。張東蓀神態自若、情緒平靜，見到吳紹鴻後，內疚地說：「你受苦了。」考慮到張東蓀此時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看守人員經過批准，同意他的家人經常來醫院看望他，並輪流負責他的生活起居。一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對峙了 20 多年的中美關係終於得到緩和。當家人告訴他這一消息時，張東蓀竟激動不已，喃喃自語：「中美不能對抗，還是我對。」似乎仍然堅持自己不同意「一邊倒」的立場……⁷³

1973 年 6 月 2 日晚 11 時，張東蓀因病不治，逝世與北京第六醫院，終年 88 歲。⁷⁴

⁷² 參考余文景(Yu Man-king)編譯，《漢譯簡明英國法律辭典》(香港：大塊出版公司出版，1973)，頁 21。

⁷³ 《張東蓀傳》，頁 447-8。

⁷⁴ 同上，頁 448。

一位在 20 世紀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頗有影響的人物終於走完了他漫長而複雜的一生。⁷⁵

同書頁 447 的一個註（註 2）左氏告訴我們：『張東蓀病逝後，張宗炳被接出監獄治療，後來病情好轉。文革結束後平反，繼續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

同書左氏告訴我們：『張東蓀，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錢塘人，1886 年 12 月 9 日（光緒丙戌 11 月 14 日）生於直隸內邱縣，父親張上蘇。』⁷⁶『1973 年 88 歲。6 月 2 日病逝於北京第六醫院。』⁷⁷

在出版《張東蓀傳》後一個月，左玉河的《張東蓀文化思想研究》也跟著於 1998 年 6 月出版。書中關於張東蓀的生卒年、月和日並沒有改變，不過張東蓀的享年卻少了一年，從 88 歲變成了 87 歲：

1948 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議傅作義將軍與中共聯繫，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 月 24 日，他作為傅作義的和談代表到薊縣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大貢獻，1949 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與中共領袖毛澤東會晤。1949 年 9 月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兼燕京大學（後為北京大學）教授。1952 年因故辭去政府職務，1968 年 1 月被捕，1973 年 6 月 2 日病逝於北京，終年 87 歲。

⁷⁸

現在我們終於有了確實無疑的張東蓀的生卒年。這要感謝左玉河的研究和挖掘。但細心的讀者可能已注意到，並且會問，為甚麼左玉河在《張東蓀傳》上說張東蓀享年 88 歲，而在《張東蓀文化思想研究》上卻說張東蓀享年 87 歲？其實若按所提供的陽曆日期算來，張東蓀去世時是不到 86 歲半，因此說他享年 87 歲是說得通的，但說他享年 88 歲則顯然是算錯了。此外，關

⁷⁵ 同上。

⁷⁶ 同上，頁 449。

⁷⁷ 同上。

⁷⁸ 左玉河，《張東蓀文化思想研究》序（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6），頁 15。

於張東蓀的生日我們只有左玉河的說法，即 12 月 9 日，至於張東蓀的卒月和日，我們則有張耀南的 6 月 23 日，和左玉河的 6 月 2 日。另外，張耀南沒有提及張東蓀的二兒媳婦因先生自殺而自殺，而左玉河則有如此說法。因為二位的看法都從張東蓀家人得來，因此我們或暫存疑，或等自己進一步的查問。可見上述羅素的溫和的懷疑論是值得回味再三的。

五、歷史事實的時間與歷史解釋關係間的二、三個相關且有趣例子

最近偶然看了一、二本與本文所討論的問題相關且非常有趣的書，茲引用數段與大家共享。若沒有近乎普遍使用某種日曆 (calendar)，今日國際貿易將是不可能。而今日所普遍使用的日曆恰好是格列高里曆 (Gregorian calendar)。⁷⁹這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公元」(public era)，實則正確的說法該是「基督教紀元」(Christian era) 而已，或充其量只能稱「西元」。⁸⁰本文從俗，不分「公元」、「西元」和「基督教紀元」。

我們知道世界將慶祝新的千禧年的開始。若不是普遍如此，則無論如何基督世界將會慶祝它；使用其他日曆的人或許毫無表示地渡過它。唯一的問題是何時舉行慶祝？肯定的，大多數的答案是公元 2000 年的 1 月 1 日，而可能忘了這個日子 (date)，若從基督教紀元 (Christian era) 是始於公元 1 年 1 月 1 日——此世紀沒有零年——算起來，只有 1999 年。然而 1999 年根本不是整數年。或許正確的答案是公元 2001 年 1 月 1 日，這確是從基督世紀算起的 2000 年——但 2001 年肯定不是整數年。無疑的，世界將在 2000 年 1 月 1 日

⁷⁹ *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 p.6. 按「格列里高曆（即今日各國通行的曆法，每年 365 日，閏年為 366，每四年一閏，此曆法為教皇格列高里十三於 1582 年修訂而成。」（張芳杰主編，李敏、張先信總編輯，《國際英漢大辭典》（台北：華文圖書公司，1990 年修訂初版），頁 1223）。

⁸⁰ 參見陳錫蕃，〈談「公元」〉，見《咬文嚼字話翻譯》（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1998），頁 39-40。

這個美好的整數年，而忽略這些計較來慶祝千禧年。⁸¹

請留意，若你對這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的答案是建立在我們即將慶祝耶穌誕辰 2000 年這個觀念上。首先，現在的證據顯示耶穌生於公元前 4 年，或甚至更早，所以耶穌的 2000 年誕辰是在 1997 年或更早時已過去。接著我們必須謹記耶穌的正確誕辰日期是個疑問；甚至我們定 12 月 25 日為官方的耶穌誕辰，我們仍須考慮這是要根據凱撒曆（即儒略曆）或格列里高曆（Julian or Gregorian calendar）來計算。兩千年下來，根據凱撒曆即儒略曆來計算，公元前 4 年的 12 月 25 日等於格列里高曆的 1998 年 1 月 7 日。⁸²儒略曆是基督教會的官方曆，迄至十六世紀末——儘管自十二世紀，若不是更早，已注意到它的缺點——在 1582 年天主教會用格列里高替代它。⁸³

基督教紀元是由戴奧尼夏（小戴奧尼夏 Dionysius Exiguus（‘Dennis the little’）——如此稱呼他是因為他自我謙沖的態度），他是個來自 Scythia（現在的 Moldavia）的僧侶。他在關於復活節（Easter）的著述中發明並使用一個新世紀（era）——基督世紀——設定它起於耶穌誕生的那一年後的 1 月 1 日。他使用他的世紀來計年，因為他不想把基督教（Christianity）與戴克里先世紀（the era of Diocletian）（用於亞歷山大計算復活節日期的方法（Alexandrian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date of Easter））連在一起。⁸⁴

開始時，現在的基督教紀元是以戴奧尼夏曆（Dionysian）稱世，但並沒有被教會當局馬上採用，且只在十一世紀後的西歐才廣泛被使用；教士 Bede 在八世紀於他的著作中用它，因此他是使此曆普及的那些人中之一人。（Bede 也使用 B.C 這個日期的觀念——但這要到後來才普及）。基督教紀元

⁸¹ *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 pp.9-10. 陳錫蕃，〈西元二〇〇〇年〉、〈再談二〇〇〇年〉分見頁 63-64；65-67。

⁸² *Ibid.*, p.10.

⁸³ *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 p.218. 按「凱撒曆，儒略曆（凱撒大帝於公元前 46 年訂定的曆法，最後被格列里高所訂定的陽曆所取代）。」（《國際英漢大辭典》，頁 1482）；〈再談二〇〇〇年〉，頁 65。

⁸⁴ *Ibid.*, p.217. 按「Diocletian 全名 Gaius Aurelius Diocletianus（245-313），於 248-305 為羅馬皇帝。」（參考，《國際英漢大辭典》，頁 1482）

直到十五世紀才在希臘世界使用。⁸⁵

戴奧尼夏 (Dennis) 從閱讀亞歷山大的克里門(Clement of Alexandra)的著作中，設定耶穌生於奧古斯德帝的第廿八年。他設定奧古斯德的統治時期始於羅馬建立後的 727 年——但他是錯誤的。他不知道奧古斯德的統治時期一向是以他與敵對者 Antony 和 Cleopatra 在羅馬建立後 723 年 9 月 3 日在 Actium 的決定性的爭權勝利戰役算起，而不是以他在羅馬建立後 727 年 1 月 13 日接受羅馬人民的帝號算起。⁸⁶羅馬的建立日期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後來，不管是對的設定還是錯的設定，羅馬的建立日期是定為公元前 753 年，正如 Varro(116-27B.C)起初所建議的。⁸⁷

若推算、記載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的日子已很難完全避免錯誤，則推算、記載神學上所說的上帝的事蹟簡直無從爭議起。一個問題是確定上帝偉大創建工程始於何日。Ussher 大主教 (1581-1656) 的計算是始於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13 日中午。其涵義是最終，第十階段的世界史，標誌著基督再臨 (the Second Coming) 始於 1997 年 (或 1998 年，若根據 E. G. Richards 的算法)。⁸⁸這個說法與人類學家單就人類起源的說法，就時間的差距而言，簡直無法比擬。理查·李基在《人類傳奇》寫道：『人類演化史裡有四大事件：人科的起源，大約是在七百萬年前；接下來是直立猿的「適應輻射」；再來，腦容量開始增加——也就是人屬起源的時候，也許在二百五十萬年前；最後則是現代人的起源。其中，又屬第四項（像你我這種人的起源）為人類學中最熱門的話題。眾人熱烈爭辯各式各樣的假說，而且幾乎每個月都有召開這方面的學術會議，或是出現一大串相關書籍和論文，但這些活動、文章提出來的論點經常彼此完全相反，令人無所適從。我必須強調的是，我所謂「像你我這種人」，指的是現代智人，也就是具有技術和創新的能力、人文

⁸⁵ *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 pp.217-8.

⁸⁶ *Ibid.*, p.218.

⁸⁷ *Ibid.*, 208.

⁸⁸ *Ibid.*, p.11.

表達素養、自省意識以及道德感的人類。』⁸⁹『按照分析，現代人類確能往回追溯到大約十五萬年前，住在非洲的一位女性祖宗。』⁹⁰這當然不會是有關人類起源的時間的最後一個推測。此外，在天文學上，在地質學上推測時間的差距數字更是驚人，分別得以幾千萬、幾百萬年和以萬或千年做單位來談論。

與本文談日期錯差極有關的有趣例子是常常改變年號所帶來的困擾。柏楊寫道：『中國歷史最使人困擾的是年號問題。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國境內就先後出現了十六個年號。即令在統一時期，年號所造成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卻改了十次年號。南周第一任皇帝武照在位的時間更短，只十六年，卻改了十四次年號。有些時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氣改了三次。第三次改元，使當時的國人不勝其煩。同時也顯示這種年號制度的嚴重缺點，那就是，在時間距離上，造成嚴重的混亂。』⁹¹顯然，傳統的中國年號並不是，也不可能，嚴格按照陰曆（農曆）來定起點的，不然一年內就不可能有超過一個年號。使整個年代問題成爲極複雜的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曆已修改過兩百次以上。⁹²其涵義是中國曆算成了專門的學問。

至於只能有一個正確答案的個人生卒年的誤差，在記載或記憶有缺陷的情況下也屢見不鮮，如我們就不知道老子的生卒年，有說是在公元前六世紀，有說是在四世紀；莊子的生卒年據說是介於公元前 399-295 年間；公孫龍可能是生於公元前 380 年；甚至孟子的卒年是否公元前 289 年也不能確定；韓非是死於公元前 233 年，至於生年也沒有確定；董仲舒的生卒年也沒有正確的記錄；王充是生於公元 27 年；郭象是死於公元 312 年等等。⁹³使問

⁸⁹ 理查·李基(Richard Leakey)原著，楊玉齡譯，《人類傳奇》(*The Origin of Humankind*) (台北：天下文化公司，1997年第一版第6次印刷)，頁115。

⁹⁰ 《人類傳奇》，頁136。

⁹¹ 柏楊，《中國人史綱》，(二冊) (台北：星光出版社，1987年十三版)，頁4-5。

⁹² *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 封底說明文字。

⁹³ 以上信手得來的例子均取自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的 Chronology of Philosophers。按此書的中文譯本無此年表。

題增加極大麻煩的是，把農曆或年號換算成陽曆，這更容易算錯。遠的不說，就讓我們看看與張東蓀齊名的張君勳罷。他生於 1887 年 1 月 18 日，死於 1969 年 2 月 23 日。他的生日有自己提供的正確紀錄，但連張君勳的生年從農曆換成陽曆時也有錯誤的報導，而犯這個錯誤的人中居然包括了為他編年譜的妻子王士瑛。她曾寫道：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公曆一八八六年）年先生生。

先生名嘉森，字君勳，一字士林，號立齋，外人以 Carsun Chang 稱之，以是年十二月廿五日，生於江蘇嘉定縣城。⁹⁴

張君勳弟子程文熙後來加了個註補正，曰：『王世瑛先生所記之十二月廿五日乃係農曆。茲經詳查是日如以西曆算，則為一八八七年之一月十八也。』⁹⁵

由於此換算錯誤的結果，王雲五等人乃於民國四十五年 1 月 18 日，提早了一年慶祝張君勳七十陽曆誕辰！那時張君勳實際上只有六十九歲。同樣情形也發生在九十年的誕辰紀念上⁹⁶，但到了百年誕辰《張君勳先生百齡冥誕紀念文集》⁹⁷則此錯誤終獲得糾正，雖所附的〈張君勳先生著作目（一八八六- - - 一九六九）初稿〉的標題顯然仍然告訴我們張君勳是生於 1886 年。⁹⁸

可能是重複王世瑛這個在陰、陽曆換算上不细心的錯誤的，還有以下數例，即《張君勳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裡的“Chang Chia-sen”就說張君勳生於 1886 年。⁹⁹張朋園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上即列張君勳的生卒年分別為 1886 年和 1969 年。¹⁰⁰最近一個的例子是潘光哲的〈張君勳對社會主義體制的觀察（1919-1922）〉一文。¹⁰¹此外顯然是在排版上把張君勳的生年日期錯誤的，則有黃

⁹⁴ 王雲五等著，《張君勳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台北：張君勳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56 年），言行錄部分，頁 10。

⁹⁵ 同上。

⁹⁶ 見《張君勳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由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於 1976 年出版。

⁹⁷ 由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於 1985 年出版。

⁹⁸ 《張君勳先生百齡冥誕紀念文集》，頁 297- 340。

⁹⁹ 見 Vol.1,p.30。

¹⁰⁰ 見該書，頁。

¹⁰¹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7 期（1999.5），頁 47 寫道：『張君勳（1886-1969）……』。

克劍、吳小龍的「1887年1月13日」。¹⁰²至於張君勳卒年的報導也有錯誤的，如上引《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第二卷：人物志，上冊，頁104即報導說張君勳生於1887年，死於1965年。¹⁰³

儘管本文處處指出時間的記載和算法皆可能出問題，但絕沒有否認時間的客觀性和它在歷史的重要性。本文同意以下所引 G.R. Elton 的看法。他說，『過去事件的日期之確定對任何可接受的歷史景象之重建當然是基本的，而這些事件是發生在時間之流內可以界定的場合，則是毫無疑問的。歷史學家於此的任務在於建立這個日期。他可能發現這個日期是以與他自己不同的時序尺度表示，因而需要換算。比方說，這個時序尺度可能依靠古代羅馬人或猶太人或回教徒的計算系統。然而，這個事實，並沒有改變一個事件在時間的位置，同時也不因任何方面因歷史學者把它記載在他操作的系統而有所改變。事件發生的時刻仍然無損——仍然完全獨立於操作它的知識。順便一提，同樣缺乏不定性也通用於日期無法確定的事件上。』¹⁰⁴

『某些自稱歷史學家的人，對確立歷史證據的真正來源這個基本責任所表達的藐視在任何沒有面臨那些因受錯誤哲學影響而奇異翻轉立場的人看來，一定是個驚愕。當然在這個層面我嘗試傳述自己奮鬥的目標（cause）；我曾談論獨立於史家以外的歷史證據之存在，以及史家在使用它之前要了解它所面臨的工作之性質。』¹⁰⁵

『觀念史家所用的資料與其他歷史資料一樣，產生在過去，存留到今日，且在被了解和使用前需要受過訓練的分析。而這個分析必需基於歷史原則，而不是評論家為研究文學材料而發展出來與真實生活更加隔閡的方法。』¹⁰⁶

¹⁰² 見黃克劍、吳小龍編，《張君勳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頁9。後來黃克劍在為劉夢溪主編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張君勳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寫的〈張君勳先生小傳〉和〈張君勳先生學術年表〉皆正確報導了張君勳的生卒年。

¹⁰³ 相關文字的作者為呂希晨。

¹⁰⁴ G. R. Elton, *Returns to Essent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9.

¹⁰⁵ Ibid.

¹⁰⁶ Ibid.

六、結論

上節曾多處徵引 E. G. Richards 的文字。他在 *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 一書中寫道：『此書中的資料在性質上是歷史的。我想到 A. W. Crobsy 曾說：「寫歷史書沒有犯錯誤就像沒有犯罪的生活，值得努力，但不可能。」書中歷史的錯誤，正如簡化一樣，皆由我負責。對於前者，我抱歉；對於後者，希望專業史家原諒。』¹⁰⁷ 本文作者也有同感。

中國思想史家史華茲在另一個完全不同（即談中國大問題和他一生研究中國的心得）的場合寫道：

這裡所涉及的不只是沒有腦筋的收集原子式的事實和「理論」之應用的競爭。正如 Popper 所堅稱的，大多數事實的觀察是「載著理論」的，這可能是真的……雖然我們也不能絕對化這個通論。有時簡要的事實可以毀掉一個理論，然而中國並不是自我封鎖的原子式的事實的大陸，而是人類經驗的廣大區域和網路。¹⁰⁸

張東蓀堅持曰：

哲學玄學其結論如何不必拘定，而其起點的素材亦必是經驗的。離了經驗，任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亦必無用，因為別人亦可同樣說得五花八門而卻與你截然相反。結果除兩存外無別法。但人類所以要知識決不貴在把許多奇怪主張羅列在面前，一例以同等價值看待。果真如此，便沒有是非了。須知是非的重要不僅在能有所立（即是）必亦在能有所破（即非）。¹⁰⁹

總結以上 17 個在同一或相關記載中提及張東蓀生卒年的資料¹¹⁰，其中有

¹⁰⁷ *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 p. xxi.

¹⁰⁸ Benjamin I. Schwartz (史華茲),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 5.

¹⁰⁹ 《科學與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7。

¹¹⁰ 其作者包括：(1) 葉其忠；(2) 紀文勛；(3) 謝扶雅；(4) 洪燮蓮；(5) 張君勱；(6) 陳榮捷；(7) 劉建國；(8) 方克立、王其水；(9) 呂希晨、王育民；(10) 蔣錫金；(11) 忻劍飛、方松華；(12) 李盛平；(13) 張儒義；(14) 張敏孝；(15) 李華興、陳旭麓；(16) 張耀南；(17) 左玉河。

9 個關於生年的記載是正確的¹¹¹；8 個是錯誤的¹¹²；1 個是不確定¹¹³。至於卒年，則有 9 個是正確的¹¹⁴；8 個是錯誤的¹¹⁵；2 個不確定¹¹⁶。一比較即可見，關於張東蓀生年的正確記載比關於他的卒年的正確記載稍高。而若我們更進一步看看只記載張東蓀生年的 12 個報導¹¹⁷，則關於他的生年之正確度更明顯：12 個中有 11 個是正確的¹¹⁸，只有 1 個是錯的¹¹⁹。

毫無疑問的，張東蓀的生年比卒年容易確定，因為前者純是歷史事實的認定和考據的工夫，只要多訪查，資料夠，則就可以定案。而後者除此之外，則有政治壓迫和避諱等等的問題，使本來已很辛苦，且通常有幾分可遇不可求的歷史證據的訪查增加了許許多多歪曲、誤解、假話、以及以訛傳

¹¹¹ 即(1)葉其忠；(2)紀文勛；(3)張君勱；(4)陳榮捷；(5)方克立、王其水；(6)李盛平；(7)李華興、陳旭麓；(8)張耀南；(9)左玉河。

¹¹² (1)洪煨蓮（推算 1887 年）（相關人名後面的年分是指對張東蓀生年錯誤的報導或推論）；(2)陳榮捷（1887 年）；(3)劉建國（1884 年）；(4)呂希晨、王育民（1887 年）；(5)蔣錫金（1887 年）；(6)忻劍飛、方松華（1887 年）；(7)張儒義（1887 年）；(8)張敏孝（1887 年）。

¹¹³ 即謝扶雅推算的 1883，1884，1886，1889 年。

¹¹⁴ (1)葉其忠；(2)劉建國；(3)方克立、王其水；(4)忻劍飛、方松華；(5)李盛平；(6)張儒義；(7)李華興、陳旭麓；(8)張耀南；(9)左玉河。

¹¹⁵ (1)洪煨蓮（推算 1887 年）（相關人名後面的年分是指對張東蓀生年錯誤的報導或推論）；(2)陳榮捷（1887 年）；(3)劉建國（1884 年）；(4)呂希晨、王育民（1887 年）；(5)蔣錫金（1887 年）；(6)忻劍飛、方松華（1887 年）；(7)張儒義（1887 年）；(8)張敏孝（1887 年）。

¹¹⁶ 即(1)謝扶雅（1962、1968 年等）；(2)張君勱。

¹¹⁷ (1)《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2)《國聞週報》；(3) *The China Year Book, 1934*（《中華年鑑》）；(4) *Who's Who in China*；(5) *China Handbook 1950*；(6) *Who's Who in Modern China*；(7)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98-1950*；(8)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9)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0)《梁啟超與民國政治》；(11)《中國新聞年鑑（1984）》；(12)《中國一百位哲學家》。

¹¹⁸ (1)《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2)《國聞週報》；(3) *The China Year Book, 1934*（《中華年鑑》）；(4) *Who's Who in China*；(5) *China Handbook 1950*；(6) *Who's Who in Modern China*；(7)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98-1950*；(8)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9)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0)《梁啟超與民國政治》；(11)《中國一百位哲學家》。

¹¹⁹ 即《中國新聞年鑑（1984）》的 1887 年。

訛，雖這些非事實的存在常敵不過人們要真相的企求，但並非真理一定勝過強權，因為往往因時間和空間的間隔和種種利害關係而使真相之水落石出呈現功敗垂成之局。張東蓀的生卒年這樣簡單的事實之能終於弄明白是因為他是個具有歷史性的人物，同時留下大量的著作使我們想要研究他的人會想要弄清楚他的生平。更重要的是，他一家人有冤獄要平反，而我們學者有真實或真理要追求，散佈。

張東蓀卒年曾是謎的最重要原因可以用政治壓迫、顧忌等來解釋。本文所談到的張東蓀的卒年之誤差問題是個看似簡單不過的事實問題，但因他的死因、或造成他逝世的原因本身並不簡單，涉及一九五〇年代初的被批鬥、文革期間被整肅、入獄，以及兩個兒子（次、三子）及兩個媳婦（次、三媳婦）因他的遭遇而自殺，以及長子精神失常，孫兒長期承受勞改等事，在面臨一家之中如此罕有巨創的情況下，且在政治避諱的前提下，難怪張東蓀的鄰居皆守口如瓶，只能說他好像在某某年死了，甚至乾脆顧左右而言其他或說不知道。至於他的家人則是事實上不能或無法回答此問題（迄至 1973 年上半年），或感情上不願或不能回答此問題，因為整個事件太無理性，太令人悚然，太令人心碎了。

此文寫作的涵義是要強調建構以自我所見、喜惡為中心的解釋之易與重現不以自我為中心的簡單事實之難。不同來源、獨立的看法而達致的結論可以提高此結論正確的可能性，以及權威性，但若是一鼻孔出氣，隨聲附和的結論，則其數量和人數再多，也不能增加此結論的正確性和權威性，它只能增加其壓迫性、獨斷性和封閉性。從中可見自由意見之無比重要，是求真的不二法門。

我自己所得教訓是：對歷史事件之記述和解釋不能獨斷，後者尤甚於前者，因為前者是比較容易找到客觀的蛛絲馬跡，而後者則常陷入主觀的喜好，失去與外界的聯繫，或成為概念解釋概念。

若面對客觀對象，如歷史事件時，已有無法得其真貌的困難，則離此比較遠，比較抽象的解釋層次則更應謙虛。但事實上所見的情況則常相反，證據越少越獨斷是常見的，因為人總是越沒有根據則越需要感情的投入以彌補

事實或理論上缺陷。

此外，事實與解釋、看法、或理論得分開，二者不是同一層次的東西。任何解釋都預設有對象，且是不明白的對象，若是明白的對象，則就沒有解釋的必要，因為將是畫蛇添足，但人們很容易因解釋而理解後把解釋與解釋的對象等同起來，因為這樣做即省腦力又方便。這在大多數情況下無可厚非，因為解釋與所釋的對象之間，即對象與所能允許的解釋範圍常沒有衝突，也就是說對象允許如此解釋。

以我們的討論為例，不管我們多麼相對主義，多麼傾向多元主義，我們不能說張東孫有幾個生卒年，因在事實、理論、常識和邏輯等等，皆不允許這個情況存在。要嗎他於某年某月某日生或死，要嗎他在另外一個某年某月某日生或死，絕對不能有二個生日或二個死日。若有如此情況，則只有一個是對的，或沒有一個是對的，而若沒有一個是對的，則我們得繼續找一個是對的。除了一個是對的外，其他無論解釋的多美好，花俏，皆不可能為真。這種情況就簡單的事情，不會有人提出疑問，但歷史事件往往不是如此簡單，因此其事實的確定就極不容易，甚至實際上不可能，因而歷史解釋的力量和必要性就重要的多了。而在這個層次上決定取捨的標準就不那麼容易，因為本身是抽象的，因此隔著太多層企圖想把比較複雜的加以分析或化約為簡單事實的障礙。但就理論而言，這種加以分疏和堅持是完全必要的，它能減少爭議，並保持學術探討必要有的標準——或求真求實的理想。也就是說，無論事實多麼不容易重建，它本身是已發生過的，即曾存在過的，研究它們並不等於創造它們，甚至是不是無中生有的建構。其實任何歷史的建構只能是依據那個已存在、現在可能沒有留下遺跡，或只留下些少遺跡的一種捉握的企圖。

已發生的歷史事件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雖其重建需要人們十分的心力才能多少重建起來，而此重建主要是心靈上的東西，也就是說理論性的，思考性的和概念性的。我們在重建過程中在某種意義上是創造了歷史，但這並不是就所研究的歷史事件本身而言之創造，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一去不復返的。而是根據這些餘留而重新建構的一種新事物。沒有這些餘留物，

的，思考性的和概念性的。我們在重建過程中在某種意義上是創造了歷史，但這並不是就所研究的歷史事件本身而言之創造，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一去不復返的。而是根據這些餘留而重新建構的一種新事物。沒有這些餘留物，歷史將等同小說、詩歌等，不必根據已發生的事實而為人思想的純粹創造物。歷史是深受時、空、人曾實際交織而成的事件所制約的。沒有歷史事件，就沒有歷史解釋。後者不能超越前者而有獨立的存在。至於用歷史解釋以創造歷史，那是針對未來的歷史而言。未來的歷史是由人在種種限制下創造出來的，而過去的歷史事件則是其中一因素，不管人們真正意識到它存在與否，因為能影響我們的東西並不必然得是我們意識到的東西，雖然在人事界有意識的行動是最引人注意的，因為這是我們能控制的範圍，也是創造價值的場域——價值預設能力，而有能力是自覺到的能力，實際上做得到的，或以為做得到的，因此個中可能有誤，因為以為能並不就是真正能，但錯誤的決定和正確的決定皆同樣有使人從事某事的動機、力量和方向。差別在於正確的決定其成功率比較高，且比較有保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正確的歷史事實，而要排除錯誤了。糾正張東蓀的生卒年只不過是個小個案而已。或許我們可以以小喻大：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是有分別的。許多歷史的證據不是第一手的，解釋尤其如此，因此我們或可引一句轉手的話來做結語。Kurt Gödel 說：「世界的意義在於分開願望與事實。」¹²⁰

¹²⁰ “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is the separation of wish and fact.”轉引自 John D. Barrow, *The Limits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Limi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封面內頁。

